歷史伴隨時間發展、推演，人的意志僅是促成歷史轉移眾多因素之一。20 世紀初，孫文等人所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中國末代王朝滿清帝國，建立亞洲首個共和國。1912 年中華民國誕生後，中華仍陷於「多災多難」的境況。神州大地戰亂頻仍，滿目瘡痍，民不聊生。[1] 內憂外患此起彼落：宋教仁遇刺、袁世凱稱帝、軍閥割據、國共合作北伐繼而分裂、南北統一後內戰依然，日本全面侵華以及抗戰勝利後國共全面內戰。[2]

在烽火連天的亂世，一場大規模內戰讓人們往往因瞬間抉擇而影響一生，個人或家庭命運隨即改寫 —— 引往生死盛衰迥異的結局。因為政局劇變、政權更迭，大批同胞不得不逃離內地，另覓安身立命之所。當中不少人棲身於英國管治下的香港，造成戰後的香港人口從 1945 年的 60 多萬，劇增至 1950 年的 210 萬！當中三分之一為逃難者，這是香港開埠以來遭遇的最大型「難民逃亡潮」，對香港政府造成巨大壓力。[3]

香港自 1841 年開埠，[4] 華南地區特別是原居廣東省的普羅大眾陸續來此地謀生，他們從事傭工、苦力、石匠、木匠、泥水匠和漁民等不同行業。赴港無非是為了營生或者避難，根本無意在港落地生根。[5] 國內政局一旦緩和，他們就會整裝返回原鄉。[6] 每當中國內地發

生戰亂，例如太平天國、日本侵華等，香港即成為人們避難的逋逃藪。[7]

香港面積狹小，卻具備得天獨厚、港闊水深的天然環境；與接壤的華南腹地和嶺南地區，無論在語言文化、民間習俗等，基本上大同小異。1950 年以前，香港政府實行自由開放的邊境政策，居民出入境並無任何管制，粵港兩地民眾可以自由往返，華南一帶特別是廣東省的貧苦大眾，皆視香港為尋求生計的福地。

1949 年，不少內地同胞為了逃避戰火，紛紛扶老攜幼離鄉別井，千里迢迢奔往海外，或者來到香港、澳門和台灣等地區。1949 年 10 月 14 日，廣九鐵路的「江南」號成為省港鐵路線上的最後一班火車；當晚開出的省港渡輪「武穴」號，亦成為最後一班來往兩地的輪船。直至 1970 年代末，省、港兩地的直通輪船和火車，才分別於 1978 年 11 月及 1979 年 4 月恢復通行。[8]

1950 年 5 月 1 日，中央政府限制兩地人民進出香港，香港亦同時宣佈取消華人可以自由出入邊境的政策。當時香港大街小巷上出現了許多從大陸逃港的人群，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前政權的顯要人物，也有不少是軍政人員或者流亡的青年學生。來港者還有追求自由生活的粵籍居民，隨波逐流，沉淪且掙扎著。[9]

逃至香港的人數與日增多，有的人形單隻影，有的人結伴而行，只見港九街頭巷尾到處都是難民。加上香港仍處於戰後復甦期，這彈丸之地出現了前所未有的人口壓力，還有隨之而來種種的嚴峻社會民生問題。港島和九龍處處可見棚屋、寮屋或木屋。各地區的居所供不應求，連狹窄街道也滿佈難民蹤影。

很多人蹲身於鬧市的隱蔽角落，或者藏匿於斜坡密集的偏僻木屋裏。他們搭建寮屋棲身，例如是港島摩星嶺、跑馬地山邊的大坑、炮台山、筲箕灣和柴灣；以及九龍的白田村、黃大仙、鑽石山、鯉魚門、深水埗、佐敦谷和獅子山腳下附近一帶地區；新界區則分佈在沙田、大埔、荃灣和元朗。更有甚者，一些原國民黨軍的失明或斷肢的傷殘人士被迫露宿街頭，備受苦難的折磨，就地拾荒度日，只能行乞為生。他們白天四處遊蕩，晚上席地而睡，深宵睡夢中常被警察抓走。他們離鄉別井，僥倖保存性命，然而踽踽獨行於天涯，蹙蹙靡騁，備嘗辛酸，受盡揶揄，血淚交織，過著悲慘的流浪生活。[10]

天翻地覆大時代

這批難民的政治命運與原國民政府有著密切聯繫。他們大多以為只會暫時滯留香港，盼望之後能赴台定居。由於當時美國冷待剛在台灣立定腳跟的國民政府，國民政府因身陷經濟蕭條，自顧不暇，加上惟恐有間諜混跡其中，未有即時接收這批老兵難民。[11] 部分滯港難民在西環鐘聲泳棚、一別亭附近棲身，獲悉上環東華醫院有救濟災民義舉，乃紛紛向該院求助。1949 年 11 月 8 日，香港一位歐籍督察帶領 148 名前政府軍人及其家屬到東華三院，並請該機構照顧他們。[12] 1949 年 12 月 30 日晚，一名江蘇揚州籍難民抵港，光顧上環浴室新生池時偶遇茶房老鄉，得知東華醫院為民間慈善機構，會派發慈善飯餐給窮苦人士，同時是華人社會與港府的溝通橋樑；翌日他走訪醫院，果真受惠。這消息一傳十，十傳百，大家爭相向醫院求助。時人謂區區二元，卻使數以千計的人群暫脫困境，堪稱神跡。於是，東華醫院接濟難民的消息不脛而走。[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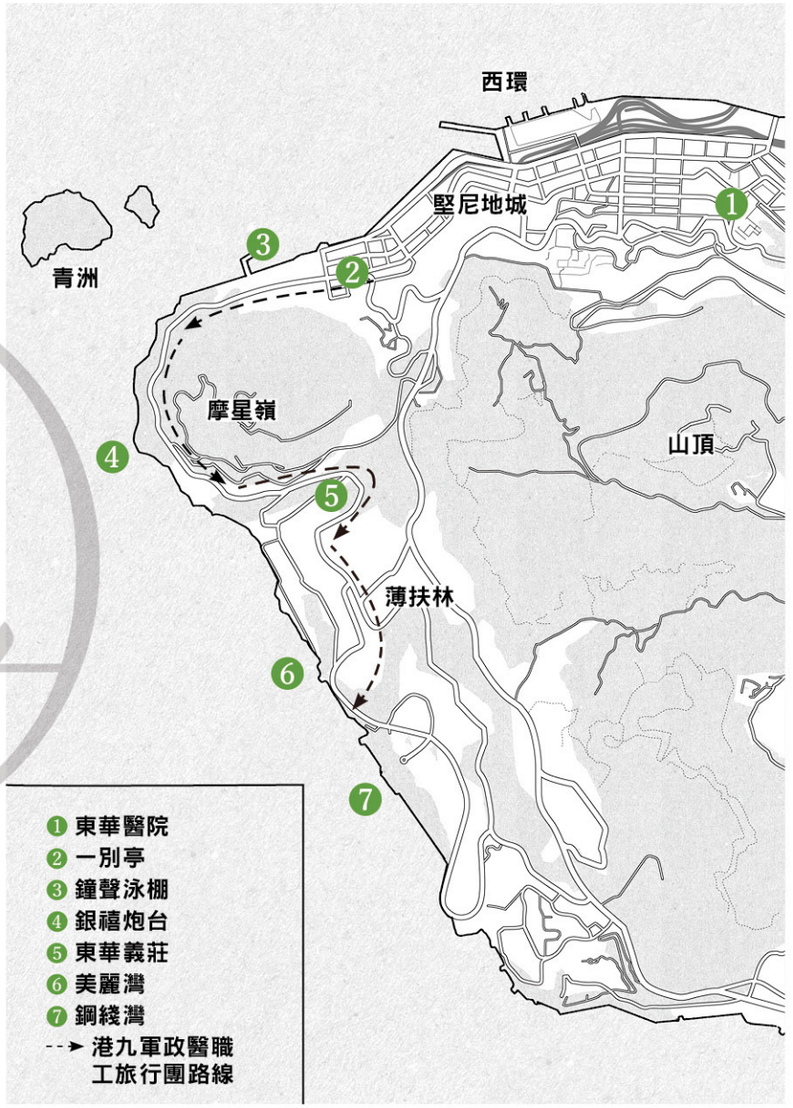
當時，東華醫院騰出了一棟四層大樓，收容部分難民，並從 1950 年 2 月開始，向持飯票者每天提供兩頓免費簡單飯餐。儘管每天按 6,921 張飯票派出飯餐，卻仍供不應求。聚集在東華醫院內外

的人數日增，醫院無法再接納更多人。[14] 香港政府以影響市容為由，將他們全部遷往摩星嶺銀禧英軍軍營舊址。[15] 鑑於難民無固定地址可以收信，院方繼續為他們代收信件和治病。東華醫院基於博愛為懷的人道精神，繼續向其提供兩頓免費飯餐；飯餐以大木桶儲藏，由社會局負責運送至摩星嶺山腳下，按飯票派發。

摩星嶺位於港島西部，是一條又長又狹的石崖山坡，形勢險要。它面向硫磺海峽，乃位於維多利亞港西邊入口的軍事戰略要地，又與青洲遙遙相望。那裏地勢陡斜、高地險要，滿佈砂石矮樹，山上仍遺留一些二次大戰廢棄的炮台。[16] 摩星嶺山上是英軍高射炮陣地，山腰有上下兩層馬路，上層通往西環，下層通往東華義莊。路旁有一座門窗全毀的水泥樓房，樓有兩層，上層面積空曠，下層為老舊但堅固的隱蔽工事，牆上還留有射擊孔。山下為一頗深的懸崖峭壁，從這裏遠眺海面，可見來往長洲至澳門的船隻。[17]

1950 年 3 月 18 日，隨著這批難民在摩星嶺落腳，這一片荒涼的山頭上隨之出現了不成規格、大小不一的油紙草棚。不少善心人士憐恤這些貧無立錐之地的難民，送來一批帆布帳篷，使一部分人得以安身；另一些人只能置身在域多利兵房或空置的堡壘內。不過，最難忍受的是附近一帶的衛生問題，因為山上充斥著垃圾雜物及排泄物，惡臭難聞。有時半夜下雨，周遭一片泥濘，人們只能站在濕漉漉的小棚子內熬過漫漫長夜。這時候的摩星嶺上聚集了大量難民，成為香港史上第一個難民營。[18]

這些難民不僅飽受戰爭帶來的痛楚和折磨，還在異地流離失所，身心絕望之極。1950 年 6 月 18 日（農曆五月初五），正是中國傳統的端午佳節，也是香港的公眾假期。當天上午 7 時許，港九軍政醫職工旅行團合共 260 多人，由堅尼地城出發，沿域多利道步行至美麗灣及鋼綫灣 [19] 一帶郊遊。隊伍浩浩蕩蕩，來到摩星嶺山腳，



難民滯留西環附近，其後被安置到摩星嶺的示意圖（1950 年）。

他們組成了一支浩大的秧歌舞腰鼓隊，揮舞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他們甫入摩星嶺，就敲鑼打鼓，一邊跳「秧歌舞」，[20]一邊喊：「回鄉去為人民服務！大陸解放，你們逃來香港，將來香港解放，再逃往何處？」摩星嶺上的「殘兵敗將」們受此嘲諷言詞挑釁，終因不堪受辱而揮拳相向；旁人再三勸止不果，由此發生嚴重肢體衝突，雙方大打出手。從該日上午 8 時 40 分至 11 時 30 分，一連發生了三次大混戰，結果造成 20 多人受傷，其中 6 人重傷。[21]

這次偶發的衝突事件後不久，難民正式結束於摩星嶺短暫的流浪生活，從此進入近半世紀的調景嶺歲月。

1949 年初期，英國政府擬定《香港緊急防衛計劃》，殖民地大臣即向內閣提交一份備忘錄，聲稱「香港短期可能面臨包括大量難民從陸地和海上湧入本港的威脅」。為了穩定香港局勢和社會秩序，中國與英國互訂了一些特殊政策和措施。中方對英方承諾：（一）不允許內地的政治運動波及香港，影響香港的社會安定；（二）以優惠價格大量供應香港必需的食品、日用品、淡水、燃料、原料和半製成品。英方對中方承諾：（一）香港不能用作反對新中國的軍事基地；（二）不許進行旨在破壞新中國威信的活動；（三）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港人員安全必須得到保障。

英國是西方陣營中第一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中、英建交一方面穩定了香港的社會秩序和治安，同時也讓香港成為中國的對外窗戶和經貿橋頭堡。[22]其間，英國與國民黨政府仍然維持一定的外交關係。[23]

為了避免毆鬥事件影響摩星嶺的管治和安定，加上英軍軍部擬收回營址以興建已婚軍人宿舍，港府乃決定把難民遷往遠離市區的地方。群毆事件發生之前，香港政府已在 1950 年 4 月 18 日的會議上，決定把難民遷往離島大嶼山的梅窩、東涌或長洲；當時，願意接受遷移者約有一千人。有關在梅窩設立難民營的撥款申請已獲立法局通過，營地圖則亦已繪就，惟當地居民對遷入難民一事強烈反對，而願意遷離摩星嶺的人數卻不斷增加。兩週後，港府決定把難民改遷位處荒郊的照鏡環——時人稱「吊頸嶺」。[24]

在設置調景嶺難民營以前，港府官員均認為這群難民短期內將返回中國內地原鄉或前往台灣定居，故承諾繼續向持有飯票者每天供應兩頓飯，並任由他們自行決定去留。港府以這種折衷方法來安置難民，實屬創舉。[25]

當時港督葛量洪（Alexander Grantham）在致英國殖民地部大臣的信函中指出：「在過去數月內，抵港的前國民黨軍人及其眷屬人數已達八千多人，他們現時正〔從〕位於港島那些衛生欠佳的營舍，被遷徙到新界一個營地，並等候遣返中國原鄉。」[26]由此可見，港府早已留下伏筆，待時機成熟便會遣返難民。

1950 年代的調景嶺仍很荒涼，但其模樣已隱然成「村」。（基督教靈實協會准用）

難民因政見和語言差異，與本地居民格格不入，難免成為被邊緣化的群體；港府面對這難以處理的「燙手山芋」，乃把難民安置到偏遠的「吊頸嶺」，意味著這山區地帶被定位為「楚界」，同時把港九地區變成「漢界」，從而分隔雙方，不讓任何「兵」、「卒」輕易越界去冒犯對方，以此來維持社會的安寧。「漢界」人強馬壯，「楚界」雖處弱勢且局限於狹窄空間，但仍堅韌不屈。港府也就默許後者自組「車馬炮」（難民自衛隊），以保衛其最後的大本營。

難民遭遣「吊頸嶺」

1950 年 6 月 26 日（朝鮮戰爭爆發的翌日）清晨 5 時許，由社會局租用的約六艘「民」字號油蘇地小輪 —— 民英、民健、民和、民福、民光和民星，搭載首批約二千名有飯票的難民（難民共六千多人，分成三批）前往「吊頸嶺」。難民按當局派發的難民證（飯票）在域多利道東華義莊[27]附近的碼頭登船。那天每人獲發乾糧費兩元，由社會局局長韋輝全程臨場指揮，並配備警察負責維持秩序，聖約翰救傷隊作應變急救措施。此外，碼頭上還有各報社記者，當地居民和一些傳道人無語送別。[28]

渡輪坐滿了穿著殘破軍服或衣衫襤褸的人群，當中還搭載了幾位會說國語的外國宣教士。他們肩負著上帝的使命，從摩星嶺跟隨難民同往目的地，繼續為顛沛流離人士提供無私援助。後來，這些西洋教士分別在調景嶺建立了眾多教會、多間中小學校、醫務所和醫院、老人院和兒童院，多年來為社區的福音、教育、醫療和救濟作出巨大貢獻。[29]

遷遣當天已過夏至，紅日當頭，瘦弱的人們在船艙裏擠迫殊甚，汗流浹背，苦不堪言。小輪徐徐駛入鯉魚門海峽，海上風急浪高，令小輪劇烈搖晃。眾人受此折騰，頓覺頭暈嘔吐，狼狽不堪。每當海浪迎頭打上甲板時，這些本已哀傷、疲憊不堪的人們，不住搖頭嘆息；有的打盹，有的蒙頭瑟縮，每個人的精神與體力皆已透支。

難民被遷往「吊頸嶺」——一個乍聽即讓人毛骨悚然之地，原來港府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經將此地正式命名為「照鏡嶺」，並出現在香港地理志上。它的地理位置正好在鯉魚門和將軍澳之間，毗鄰照鏡環，是一個三面環山、一面臨海的荒山半島，當時實屬一處荒蕪偏僻、荊棘塞道、渺無人跡的荒嶺。

故事要從年僅 28 歲即任職加拿大曼尼托巴（Manitoba）省督私人秘書兼司庫的倫尼（Alfred H. Rennie）說起。他於 1890 年 1 月抵達香港，任職香港工務局。倫尼來港前獲美國波特蘭麵粉公司（Portland Flour Millings Co.）任為東亞代理銷售人，從而積累買賣麵粉業經驗。1895 年他辭去港府公職專注於麵粉業，計劃創辦麵粉廠。他獲城中富商遮打爵士（Paul Chater）和麼地爵士（H. N. Mody）支持，集資一百萬港元成立香港製造麵粉有限公司（The Hong Kong Milling Company Limited），準備與進口自美國的麵粉展開競爭。1905 年倫尼以五千元購下五桂山照鏡環附近四百多英畝土地，開設香港磨麵粉廠（Hong Kong Flour Mills，或稱 Rennie's Mill〔倫尼磨坊〕），廠房建造時引進了最先進設備，落成時在規模和現代化等方面都屬世界一流。麵粉廠聘用 125 名工人輪班工作，每週 6 天、每天 24 小時操作，生產優質麵粉。[30]

不幸的是，倫尼經營麵粉廠失敗，他乘搭私人豪華遊艇「加拿大」號在鯉魚門水域投海自盡！1908 年 4 月 14 日（事發後兩週），英文報《德臣西報》（*The China Mail*）曾刊登法庭的死因研訊，為此作出詳盡報導。倫尼經營麵粉廠時遇上了外圍經濟緊縮時期，尤